

从《闽中新乐府》中看林纾前期的文学思想与情怀

梁肇龙、张惠思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摘要

林纾为桐城派旧体诗人，但以翻译西方小说闻名中外。林纾在晚清变法时期加入维新行列，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文人的思想熏陶，曾在 1897 年写下了他第一本以白话入诗并具有现实主义情怀的诗集《闽中新乐府》。这部诗集中的作品的内容不乏民主思想，不仅控诉满清大臣官吏的迂腐，更责斥西方帝国主义强权侵略中国的贪婪以及鞭挞晚清社会的旧文化及旧道德。此外，林纾在诗集中多次以中西对比的视角进行书写，展现其超前的维新观念，除了大力主张“向西方学习”，更进一步提出动摇中国皇权制度及封建纲常伦理的想法。而且因为诗集的发行还赶在“戊戌变法”及“诗界革命”之前，为后者起着先导的作用。若要考察的是林纾前期的文学思想与情怀，并探究林纾对时代启蒙命题的思考，《闽中新乐府》无疑是最好的考证材料，因此本文尝试从此诗集中探讨之。

关键词：《闽中新乐府》、林纾、思想、情怀

**On Lin Shu's Early Literary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rough his Poetry, "The New Yuefu".**

LIONG Siew Luong and TEOH Hooi Se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Lin Shu, a poet from the school of Tong Cheng, was well-known for his translation of foreign fiction. His participation in constitutional and modernization reforms led by Kang You Wei, Liang Qi Chao and Tan Si Tong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nfluenced his writing. His first volume of *bai hua* (plain speech) poetry "min zhong xin yue fu" (The New Yuefu) was written in 1897, which expressed a sense of realism. His poetry shows his interests in democratic values. His poetry mainly accused the corruptions of Manchu officials, criticized the greed and aggression of western imperial powers, and the old customs and morality of China. Lin Shu's poetry employe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his study of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which has been considered progressive by literary critique. His poetry not only advocated "Learning from the West" but also promoted the change in Chinese monarchy system and the feudal rules and ethics. The volume was published before the movement of "Hundred Day's Reform" and "Poetic Revolution", which was believed to play an enlightening role in both movemen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amine Lin Shu's literary thoughts and themes through the study of his poetry, "The New Yuefu".

Keywords: "The New Yuefu", Lin Shu, Thoughts, Feelings

前言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出自晚清桐城派。他是一名旧体诗人，但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古文大家及西方小说翻译家。他曾在晚清变法时期受到当时拟发动“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梁启超及谭嗣同等维新文人的思想熏陶，加入维新行列，接受社会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戊戌变法之前，林纾写下了他第一本以白话入诗、具有现实主义情怀的诗集《闽中新乐府》。要考察林纾前期的文学思想与情怀，其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无疑是最好的考证材料。他在晚清社会改革风气鼎盛期间写起了白话诗，以摹仿白居易讽喻诗的写作手法创作了三十二首乐府诗。其系统而集中且具有强烈的维新倾向的《闽中新乐府》在近代文学史上无疑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

1897年11月，福州人士魏翰在福州出资刻版印行林纾的《闽中新乐府》（署名畏庐子）。《闽中新乐府》是林纾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亦是晚清以降第一部最早以白话入诗的诗集。诗集收诗二十九题三十二首，诗的内容不乏民主思想，针砭社会现实，表现出诗人的维新倾向。这些诗揭露了社会各阶层的陋习，不仅控诉满清政府的腐败；更在字里行间责斥西方各国强权宰割中国的贪婪、哀痛国家的危亡以及鞭挞晚清社会封建的旧文化及旧道德，表现出进步的思想情怀与意涵。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写说：“《闽中新乐府》里，可以看出林先生的新党倾向。在康有为未上书之前，他却能有这种见解，可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的维新党。”（郑振铎，1924）郑振铎肯定林纾在晚清时期的思想上有着超前的维新观念，是与其晚期为了捍卫古文而表现出的保守思想有着极大的差异。虽然林纾自认写诗非其专长，“吾不善为诗，俚词鄙谚，旁收杂罗，谈格调者将引以为噓，而吾又不乐为诗人也”（林薇选注，1988），但这恰恰便是《闽中新乐府》的优胜之处。诗集在形式上虽是仿白居易的讽喻诗格调，看似无多大的创新，属“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呈现诗人的文学思想，但在语言上却存有它独特的表达。林纾的白话诗不像晚清当时流行的“同光体”诗歌那样避俗避热、那样生涩奥衍，而是“俚词鄙谚旁收杂罗”（魏延《闽中新乐府》序），写得明白晓畅，如《郭老兵》一诗的开首——“郭老兵，六十一，册上署年四十七”颇有顺口溜的味道，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很容易理解，很容易记忆（黄榕官，1986）。可见，《闽中新乐府》诗集中的语言文字在少了晦涩的古文之后，反而写得明白浅显，这显然是白话的好处之一，而篇与篇之间的生动有趣亦反映林纾前期文学创作的重要象征，同时展现出白话文在晚清时期突破了古文学的桎梏，为二十年以后的五四白话文运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闽中新乐府》：白话诗的现实主义情怀

诚如前言，林纾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著名的古文家兼翻译家，胡适在1923年就称他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胡适，1998）。但与同时代的文人相比，林纾不仅是一个翻译家，他还是一个白话诗人。他的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中的三十二首诗篇紧紧将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反映了晚清社会中现实的黑暗面，成为晚清维新时代特有的历史潮流与关注点，透过《闽

《闽中新乐府》中的白话诗，我们可以窥测林纾对于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亦同时对诗篇中展现的现实主义情怀进行剖析。

从作品的中心思想来分析，《闽中新乐府》无疑是一部以“启蒙”与“救亡”为主要写作视角的白话诗集，为二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下了革命的根基。它在反映社会现实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以“乐府”的形式直接议论时政及抨击社会风俗的败坏，其目的不在于宣泄不满情绪，而是企图通过文字去改变国家与社会的现状，体现了林纾当时作为维新人士所表现出来的理想政治主义。诗集中弹劾时政的多首诗篇，如《国仇》、《渴睡汉》、《哀长官》、《郭老兵》、《獭驱鱼》、《五石弓》、《关上虎》、《番客来》、《灯草翁》、《谋生难》、《破蓝衫》、《村先生》、《知名士》等乐府诗锋芒所指广及内政、外交、兵制、税收、教育各领域；后一类则抨击社会封建迷信及陋俗为主，如《小脚妇》、《水无情》、《灶下叹》、《检历日》、《郁罗台》。《棠梨花》、《跳神》《生骷髅》、《非命》等，举凡缠足、溺女、虐婢、跳神、做醮、看相、看风水、检日子以及鸦片流毒、庸医误人都在鞭辟之列（曾宪辉，1994），成了诗集中鲜明的主题特征。

这些收录在林纾《闽中新乐府》的诗篇大部分都真实地描写了晚清社会的政治格局与下层人民的生活疾苦，展示了乐府诗鲜明的现实主义情怀以及“讽喻诗”该有的写实艺术和大胆讽刺朝廷社会的精神。从林纾《闽中新乐府》的根本主张来看，他的诗犹如民间喉舌，用诗的语言刺穿晚清社会的虚假面，用胡适的话来表达，即“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胡适，1998）。作为政治讽喻诗，林纾做到了以诗论政、以诗叙事的能力，首首诗的字里行间皆充溢着诗人对于社会现状的悲愤情感与无尽的谴责。《闽中新乐府》可说在戊戌变法来临以前开启了政变的契机，也同时为后来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二、骨子里的爱国情怀

早期的林纾是一个热切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者，与友人“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高梦旦，1949），这在诗集中都表现无遗。晚清时期，他加入维新行列，原因还是在于与他本身对国家衰败而感切身之痛有关。晚清维新运动作为一个立足于现实之上的政治理想主义运动，它的出现是基于对现实不满而发起的一场企图改变社会现状的政治运动。林纾作为其中的一份子，籍着《闽中新乐府》展示了其正视现实的勇气。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发动的戊戌变法，然而《闽中新乐府》却走在了“戊戌变法”、“诗界革命”之前，尝试了以白话作诗，抨击政治与社会的黑暗。1924年，胡适在林纾逝世以后撰写了《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一文，说道：“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达他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并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不算得公平的舆论”（胡适，

1998)。胡适的言论佐证了林纾在近代文学转型中对于白话文学的贡献以及其个人卓越与宽阔的人文视野。

林纾在《闽中新乐府》诗集中涉及与讨论的课题与当时的维新运动具有不可切割的关系，它不仅是一把利器、白话改革的先锋，同时也是维新变法时期的强音，表达了爱国主义、科学民主制度的主题思想，其中多有“感时忧国”之作，从不同角度去诠释了诗人的爱国思想，如《国仇》（林薇选注，1988）一诗揭露了诗人对各国列强侵占中国而表现出愤慨激昂的情绪：

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德法偕东洋。
东洋发难仁川口，舟师全覆东洋手。
高升船破英不仇，英人已与日人厚。
沙俄袖手看亚洲，旅顺烽火连金州，
俄人柄亚得关键，执言仗义排日本。
法德联兵同比俄，英人始悔着棋晚。
东洋仅仅得台湾，俄已回旋山海关。
铁路纵横西伯利，攫取朝鲜指顾间。
法人粤西增图版，德人旁觑张馋眼。
二国有分我独无，胶州吹角声呜呜。

.....

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
诸君目笑听我言，言如不验劓吾舌。

这首诗注有一小标题：“激士气也”，表达了诗人写此诗的目的乃在于重振军心，试图唤醒国人救亡图存的“士气”，在诗的最后更以“我念国仇泣成血”的赤忱之心，激励国人誓报国仇，充分表达了他忧国爱民之心。另外，《村先生》（林薇选注，1988）一诗则反映了诗人对封建主义启蒙教育的批判：“村童读书三、四年，乳臭满口读圣贤。偶然请之书牛券，却找不出‘上下论’。”这不就与林纾后来在五卅时期写《论古文之不宜废》中“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同出一辙吗？林纾似乎早在晚清时期有了文学改良之想法，但晚年却因捍卫古文而走上了保守派的道路，不得不与白话阵营为敌。《村先生》诗前有一小序：“讥蒙养失也”，批判儿童处在封建主义启蒙教育中的错误，同时呼应了他在《闽中新乐府》序中所要表达有关诗集出版的初衷：“儿童初学，骤语以六经之旨，茫然当不一觉，其默诵经文，力图强记，则悟性转窒，故入人以歌诀为至。”可见，林纾在当时亦曾抨击古文字的弊害，反对幼童死记硬背连教书先生都无法解的诗词歌赋，并在诗中举法国小学教育为例，强调爱国主义与教育的重要性：“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儿童读之涕沾襟。”，同时指出启蒙教育对儿童的作用：“论月须辩无嫦娥，论鬼须辩无阎罗”、“勿令腐气入头脑，知识先开方有造”、“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先爽，方能陵驾欧上人。”，表现出其对儿童启蒙教育关乎国家未来命运与发展的理想主义精神。另外，在《兴女学》（林薇选注，1988）一诗，林纾则从变法图强的角度赞扬了上海办女学的“盛举”，批判封建礼教中重男轻女的想法以及对女子青春年华

梁肇龙、张惠思

从《闽中新乐府》中看林纾前期的文学思想与情怀

的摧残，并举出了西方妇女教育发达而导致国家强盛的事实，说明了兴盛女学的重要性：

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
 华人轻女患识字，家常但责油盐事，
 夹幕重帘院落深，长年禁锢昏神智。
 神智昏来足又缠，生男却望全先天。

.....

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
 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

.....

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
 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

以上三首白话乐府诗，我们可以看到林纾在创作时以中西文化与状况作对比，同时反映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军事与教育方面的先进。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的五四，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向西方主义学习，林纾自然也是其中一个。从《闽中新乐府》中不难见到林纾大力推动“向西方学习”的概念，表现出其积极爱国的态度，却不忘讽刺清廷大臣的昏庸与无力，暴露朝廷在外交、军事与内治政策上的失败，如《渴睡汉》（林薇选注，1988）一诗：“渴睡汉，何时醒？我闻西人外交礼数多，一涉国事争分毫。华人只争身份大，铸铁为墙界中外。挑衅无非在自高，自高不计公家害。我笑富魏公，区区争献纳。若果赵家能自强，汴梁岂受今人踏。.....西人谋国事事精，兵制尤堪为法程。国中我自宗王道，参之西法应更好。”林纾在诗中用“渴睡汉”来比喻朝廷外交大臣的迂腐，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林纾对朝廷在外交上的非议，诗中更强烈希望朝廷能在“兵制”上“参之西法”，表现出诗人对西方制度的推崇。

另外，在维新理念的渲染下，林纾也较为深入地描绘了清廉朝廷官员反对“变法”与“向西方学习”的腐朽与昏庸，如《哀长官》（林薇选注，1988）一诗的副题为“刺不知时务也”，意指官员在国难日亟的情况下不讲时务，反而一派高风亮节的姿态，完全无对外敌入侵有任何的畏惧之心：

长官长官风节高，口食粗粝身布袍。门庭似水杜干谒，门丁枯坐瘦见骨。三日厨中断肉腥，上房灯火微于星。外虽寒瘦心则乐，一清谓足酬朝廷。.....西人纵使畏廉史，长官当为朝廷地。俄英法德如封狼，东洋尤嗜渔人利。长官屡屡挑欧西，西学不与中学齐。海口无兵内无备，先讲修齐后平治。

在《知名士》一诗，林纾又进一步为那些不知时务、不讲维新的“经学之人”画像，讥讽他们毫无远见，各国列强已侵吞国土，他们尚在做着春秋大梦：

外间边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作梦。
 白头老辈鬓飘萧，自谓经学凌前朝。

偶闻洋务斥狂佻，此舌不容后辈饶。

.....

方今欧洲吞亚洲，噤口无人谈国仇。
 即有诗人学痛哭，其诗寒乞难为读。
 蓝本全钞陈简斋，祖宗却认黄山谷。
 乱头粗服充名家，如何能使通人伏？
 卢转运，毕尚书，昨有其人今则无。
 名士名士将穷途。

这一首《知名士》同样呼应了他诗集中的另外一首感叹士大夫的迂腐之诗《破蓝衫》，两首诗都在议论身穿书生长袍的读书人不思求精，满口仁义道德，却漠不关心晚清大门已被列强的大炮轰开，还在几案上“论边事尊攘，咬定春秋义。边事凄凉无一言，别裁伪体先文字”。林纾甚至感叹道：“于嗟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来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破蓝衫》的最后，林纾明确地说明：“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似乎也借以警世，在国家危难之际应讲求时务，通过变法来拯救日渐衰弱的国运。

以上可见，林纾在这些爱国之诗中一再抨击自家朝廷官员、士大夫的迂腐和无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感到忧忿，但又不忘记主张“向西方学习”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如其《杀人不见血》一诗中主张大夫开药方时兼用西药，振兴医学：“急需合众兴医会，医生药物参中外”。林纾所主张的不仅是如洋务派所推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用西方的钢铁制造术，打造船坚利炮，而是进一步动摇朝廷的内政制度和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因此，林纾的《闽中新乐府》展现难得可贵的地方在于嘲讽又不忘爱国，反帝又不忘“参之西法”，在戊戌变法之前能给晚清朝廷固封迂腐的弊端一番痛击，深刻地表现了其尖锐的思想情感。

三、反映下层人民疾苦

从《闽中新乐府》的开篇《国仇》，我们尽可见林纾借诗处处反讽朝廷。在维新思潮的鼓荡下，林纾在无数首诗中用讽喻的形式鞭挞晚清朝廷的腐败、欺压百姓来反映出下层人民的疾苦，如《关上虎》（林薇选注，1988）一诗就揭发了“税厘之丁”收受贿赂、横恣肆虐，以“虎”来比喻朝廷官员的贪婪而连累无辜小民大受其害的事实：

虎来！虎来！关上之虎牙爪开。关上人多安有虎？蠢役作威挟官府。小民负贩图营生，截路咆哮闻虎声！虎吃肉、不留骨，官纵虎丁倚绕越。官岂全无愧悌心，当关纵虎防行人？无如比较急于火，宁我负民勿负我。堂皇飞籤责虎丁，有船到关船须停。虎丁得钱实腰橐，诈言船过船无错。既将膏血濡爪牙，私货过关关不哞。有私易行无私滞，小民私纳成常例。丁饱其余始及官，官丁附丽如肺肝。民间罚税重于税，二分归官八归吏。

梁肇龙、张惠思

从《闽中新乐府》中看林纾前期的文学思想与情怀

另外，《番客来》（林薇选注，1988）一诗也批判了清廷官员关吏搜刮南洋归国华侨的民脂民膏，以致他们都有国而不能归，一入国门即遭到关吏的剥削，黑暗社会的残酷迫使南洋华侨“归乡无路惟流涕”：

番客来从新加坡，关吏垂涎丁谴呵。当关问客装几许，朝廷税计难宽汝！一领毡，三洋钱；一环玉，税两六。吹毛索瘢愿未已，眈眈身上搜银纸。银纸若登税则中，厦门税额尤亨通。眼光红，银色白，过关胆落南洋客。

《闽中新乐府》中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暴露，无一不反映了朝廷内治的弊端，一为大臣之迂腐；一则官员关吏之残暴与贪婪。同样为官吏之害，林纾在《草灯翁》（林薇选注，1988）中通过描写一个颠沛流离的孤独老翁被官府剥削后的悲惨际遇：

灯草翁，卖灯草，日得百钱养衰老。
力疲脚惫行蹒跚，冬苦严寒春苦潦。
百钱匀作两日餐，嗽声达晓焦肺肝。
半间破屋傍村店，忍饥不卖存余羨。
此居留为市槽钱，估值曾无四十千。
突来厮役猛于虎，清厘屋税归官府。
里保偕差逐处行，严征无论上下户。
.....
里保邀差醉村肆，老翁哀痛号天地。
被去衣亡满瓦霜，凄凉通夜长无寐。

全诗围绕着小题“伤贫民苦于税券也”来展开诗人对老人的际遇给予的同情，其感时伤怀的调子，在伤痛中谴责税吏比山林中的老虎还凶猛，迫使老翁无家可归，就连“市槽钱”都给盘剥。诗人善于拈取了生活中见到的典型事例，通过事实的描述和形象的刻画，为人民的疾苦呼号，对社会的弊端作了如实的批判（曾宪辉，1994）。另一方面，林纾除了籍诗控诉朝廷官员的无底线剥夺，也在《谋生难》（林薇选注，1988）一诗中感叹了朝廷“重士轻工商”的民族弊端而造成下层人民“谋生难”的困境：

谋生难！谋生难！西人夺我华人餐。西人艺事皆精绝，西工巧压华工拙。一针一线皆西来，华工失业殊堪衰。.....吾华官民隔如天，官虽久任无十年。只求无事免大计，岂能管及民工艺。富商畏官如畏虎，即倡公司敢集股？失业愈多民愈穷，四周环顾无乐土。我思华人失所长，币在重士轻工商。

尤其在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瓜分中国，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反而进一步加速中国传统工业的破产，下层人民无业可活——“失业愈多民愈穷，四周环顾无乐土”，诗人将情感投射在民生的艰难之上，为他们悲惨的命运而感伤。

四、女子命运的挽歌

在“女性系列”的课题上，林纾更是在《闽中新乐府》中表现出更多的维新思想。如《水无情》（林薇选注，1988）深刻体现了反映社会封建迷信制度对女性带来的悲惨命运。这种具备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对五四文学的发展具有高度的影响与积极的作用：

孰道水无情？无情能作断肠声！
孰道水无情？有情偏浸出胎婴！
女儿原是赔钱货，安知不做门楣贺。
脐上胞衣血尚殷，眼前咫尺鬼门关。
阿爷心计忧盐米，苦无家业贻兄弟。
……
娘亦当年女子身，育娘长大伊何人？
若论衣食妨兄弟，但乞生全愿食贫。
岂知聋聩无头脑，一心只道生男好。
杀女留男计自佳，也须仰首看苍昊。

林纾在《水无情》一诗严厉批判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重男轻女的现象，谴责“溺婴”这一违反人伦天理的迷信恶俗，迫使女婴刚出生尚未落地——“脐上胞衣血尚殷，眼前咫尺鬼门关”，生死已在一线天。对于这一惨无人道的做法，林纾在诗里行间无不对弱小女子的无情命运给予无尽的悲悯与惋惜，并对人们愚昧、冷血的态度发出尖锐的呐喊。

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命运尤为坎坷，尤其是处于下层阶级的妇女，更是有着悲惨的命运。林纾笔下的《小脚妇》，顾名思义即说明女子缠足的害处。在晚清这一中西交汇，文化认知转型的时期，林纾对于女性的人权、主体、地位以及自由四方面重新给予审视，在《闽中新乐府》中开启了其对中国女子悲惨命运的书写与关注，以下为《小脚妇》三首之一（胡适，1998）：

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嬷嬷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问君此脚缠何时，奈何负痛无了期？妇言依不知，五岁六岁才胜衣，阿娘做履命缠足，指儿尖光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三更哭。床头呼阿娘，女儿疾病娘痛伤，女儿颠跌娘惊惶；儿今脚痛入骨髓，儿自凄凉娘弗忙！阿娘转笑慰娇女，阿娘少时亦如汝。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功夫为汝缠。岂知缠得脚儿小，筋骨不舒食量小。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

《小脚妇》通过女子从小缠足，历经切肤之痛来表达女子缠小脚所带来的种种痛苦。诗人对于封建社会中女性从出生就被迫以三寸小脚示人感到悲愤与无奈，以一曲挽歌尽诉女子无力反抗世俗的悲惨命运。此外，林纾笔端下妇女悲惨的命运

梁肇龙、张惠思

从《闽中新乐府》中看林纾前期的文学思想与情怀

还表现在《灶下叹》（林薇选注，1988）一诗，体现了林纾对妇女身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同情：

青丝一束蓬蓬乱，清晨有人灶下叹。不叹食人残，不叹衣裳单，不叹欹枕眠不安，不叹震喝捶心肝；只叹主人顾，撩得家婆怒。草草画眉向镜愁，情丝岂为主人抽？……背上寸寸皆杖疮。旧疮未愈新疮续，大杖几几折其足。主人屏立不敢言，言来转益严刑酷。

诗中写到传统社会“买人为奴”的封建压迫，深刻描绘了女子身受委屈，重重虐待的无力感。林纾籍着西方社会对于女性自由平等的思想给予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缺乏平等待遇作出谴责与批判，诗的最后写道“我闻欧西有奴禁，买人为奴国所摈。人无贵贱咸等夷，安有呻吟灶下时！”，乃诗人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对女性缺乏尊重的不满。

五、封建迷信的桎梏

在破除迷信的问题上，林纾在《闽中新乐府》中更是展现出强烈的情绪表达。在《棠梨花》（林薇选注，1988）中，林纾抨击了人们的愚昧，听信风水师的假言假意，以致耽误了葬礼之事：

棠梨花，为谁好？三椽权屋迷春草。屋是城中显宦家，二十年前才告老。南庄屋，北庄田，岁入百间百万钱。钟停漏歇主翁病，死时吊客如云盛。枕块方披孝子哀，开场先下地师聘。地师来洋洋，奴仆相扶将。地师病嗽需梨浆，地师嗜酒陈杯觞；地师烟瘾芙蓉香，银灯照耀地师床。地师怒且语，主人伏如鼠。地师欢笑主起舞，明朝得地生制府。地师登山腰舆高，山佃疾尾如猿猱。朋奸齐心作主贼，地师山佃甘如蜜。分赃不均忽懊恼，地师山佃辞颠倒。主人右地师，但求吉地无嫌迟。一年水患田不收，二年火患焚高楼。三年盐业败垂尽，主人日夕怀隐忧。长生库质黄金钿，华堂犹设地师膳。还期富贵墓中来，山南山北搜寻编。地师橐未实，主人风水须时日。孰过荒凉权屋前？落叶成堆秋瑟瑟。地师地师道葬经，何不自家安先灵？妖言惑众干天怒，人祸虽逃有鬼刑。

这一类有关反对封建迷信的主题，在林纾的《闽中新乐府》诗集中十分突出。除了《棠梨花》讽刺迂腐孝子听信风水师的无稽之谈，而迟迟不安葬亲人，使先人不得安息，反而有违孝道。《郁罗台》则讽刺人子请道士“打斋”替亡亲超渡，实际上不过是江湖术士的骗局——“果犹地狱岂无守，张三破狱李四走？修狱经费谁取偿，道士诩人神洋洋”（曾宪辉，1994），好比《棠梨花》中的地师一样“妖言惑众干天怒”。林纾在《郁罗台》中大力鞭挞此等恶习，责斥迷信是落后的表现，非但无教育的作用，反而封闭了民智，增添愚昧。另外，《非命》一诗则讥笑“士大夫听术家之言”，以批算生辰八字的方式来决定一生的福祸；《检历日》斥凡事得翻阅皇历来卜可否行其事，就连安葬亲人都得挑选良辰吉日，实为无稽：“葬亲我国胜欧西，必须择日真无稽。一心行孝一求福，一半欣幸一半

哭。我想此时孝子心，天人大战堪捧腹。”林纾以诙谐的笔法描绘了封建习俗的穷形尽相，讽刺之情尽显其中。这些穿行在民间巷宅的神棍、术士、地师、道士及和尚，不但误人智慧，损人钱财，危害众生，更使国运衰退，林纾以诗尖锐地批判现实，将生活中所见所闻之事，凡“有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其诗虽产不多，但其爱国思想、为民间疾苦发声的不畏惧精神都极力地洋洋洒洒写在了这一本薄薄的诗集之中。

六、总结

在晚清国运衰退的严峻时代里，林纾透过白话诗集关注了国家兴衰、民族存亡、革命斗争与社会制度改革等宏观命题。从《闽中新乐府》的主题思想与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林纾对那个所处的时代启蒙命题的精辟思考。林纾以诗论政，对现实的黑暗、不公不义的事件的描绘中，往往掺杂着个人独特的理性思考。林纾运用幽默和讽刺的写作手法刻画了许多有趣的人物形象，如渴睡汉、村先生、哀长官、知名士、生骷髅、郭老兵等都使得其诗增添不少诙谐感，但同时又不失严峻的审视。梁启超在 1902 年 11 月推动“小说界革命”，大力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而林纾在五年前，即 1897 年便已开始推动“新民”的思想，但他却不曾与梁启超走在同一战线上。其《闽中新乐府》做到的反而是一种先导的作用，它开启了戊戌变法发动的契机，也促使了后来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革命思潮，而其诗集所宣扬的反帝爱国，提倡民主科学以及推倒封建迷信与文化，皆与二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一脉相传。总的来说，《闽中新乐府》架起的不只是晚清社会的“启蒙”与“救亡”，它还架起了晚清与五四之间的革命桥梁。即便林纾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绝大多数在于翻译，但他的《闽中新乐府》在晚清白话文学改革上依然有着不可抹杀的草创之功。

梁肇龙、张惠思

从《闽中新乐府》中看林纾前期的文学思想与情怀

参考文献

- 高梦旦（1949）。《书〈闽中新乐府〉后》。初收录于1949年4月世界书局版《春觉斋著述记》，本文引自林薇选注（1988）。《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胡适（1998）。《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出处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适（1998）。《白话文学史》。出处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适（1998）。《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出处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黄榕官（1986）。《论〈闽中新乐府〉》，出处《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86年00期。
- 林薇选注（1988）。《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郑振铎（1924）。《林琴南先生》，初载1924年11月《小说月报》第15卷11期，后收入钱钟书等著《林纾的翻译》。
- 曾宪辉（1994）。《论〈闽中新乐府〉——兼谈其梓行与其它》。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